



21 世纪文学新势力： “新移民海归文学”

□戴瑶琴

“新移民文学”的崛起是20世纪世界华文文学发展中的大事件,它宣告了一个新的写作时代的到来。自上世纪80年代肇始,至今已将近30年,“新移民文学”无论是从概念命名上,还是从主体结构上,都出现了新的变化,最显著的现象之一是新移民作家群发生了分化,扎根西方与回归中国,成为“新移民”的两种基本选择,但更常见的情形是当前相当数量的“新移民”作家同时活跃在海外和大陆两个空间。回望2004年,陈瑞琳、张翎、沈宁、少君等创作者组团访问国内,如今新移民作家或以集体或以个体参与大陆的文学活动日益频繁,其中特别要提出的是“新移民作家国际笔会”已在中国(南昌、成都、西安)举办了三届。进入21世纪,我们发现,之前对“新移民文学”的界定已经越来越难以负载华文创作的多元含义。

“海归文学”不是新世纪以来“新移民文学”的特有现象,但它将是世界华文文学领域的一个新热点。20世纪初期,大批海归学人,以其丰富的创作实绩为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了新鲜与惊喜。我们暂且不去统计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多少海归作家,仅仅是现代文学的六大家“鲁郭茅巴老曹”,就都有海外留学或者讲学背景,域外经验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归文学”并不是当前“新移民文学”发展中的新生现象,而可以看做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海归文学”的延续和发展。

今年5月施雨的《上海“海归”》的出版是一个信号,虽然书中的“海归”是有地域性的,但“海归”由“新移民”主体的再次提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考察视点,这既是“新移民文学”研究的一种细化,也是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主动接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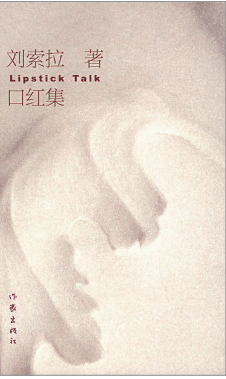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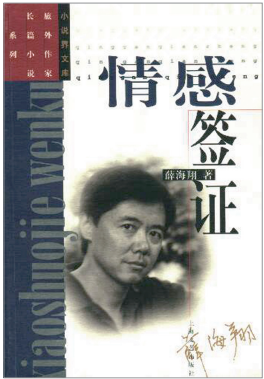
刘俊在《“新移民海归文学”:新立场、新视野、新感受、新文学》一文中指出“新移民海归文学”是海外“新移民”作家的一次新出发,是海外“新移民”作家的一次新开拓,是海外“新移民”作家的一次新蜕变、新升华。而这种种新变的发生动因是“新移民”作家的“二次文化震荡”和“二次身份转换”。如果将“新移民”的界定扩展,不局限于20世纪70年代末从大陆移民海外的新移民,而是将这份名单延伸到港台,那么可以说,“新移民海归作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例如,旅欧的刘索拉,回国后创作了《女贞汤》《口红集》;龙应台回台后推出了《亲爱的安德烈》《目送》;虹影常住北京,往返中欧之间,相继推出了《上海王》《上海之死》《好儿女花》;旅美的施雨,今年完成了《上海“海归”》;薛海翔曾经是90年代美国“新移民文学”的重要力量,现居住上海从事影视剧编剧;旅加的阎真90年代归国后更是创作了重量级小说《沧浪之水》。

若将“新移民海归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进行宽泛地解释,目前“新移民海归文学”的对象包括两个作家群体。第一,是旅居国内但已拥有外籍身份的“新移民”;第二是保有中国国籍留学归国的学人。在现代文学领域,为中国文学做出重大成就的学者和作家通常是后者身份。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种身份的创作者将是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潜在的庞大作家群,即“70后”、“80后”的中国留学生,这也与王列耀提出的欧美华文文学的“后留学生文学时代”相呼应与对接。但就目前创作实绩来说,我们关注的“新移民海归文学”的对象多属于第一种身份背景。

陆当代文学作品相比较,具有十分个性化的写作风格和思维角度。阎真是“新移民海归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的一个交集。自加拿大文学在写作“新移民文学”的代表作《白雪红尘》(大陆版名《曾在天涯》)之后,阎真回国后创作了完全是反映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沧浪之水》,在自审和他审男性心灵世界的同时,也关注女性,完成了《因为女人》。应该说,阎真的“海归”创作已完全脱离了留学题材和异国图景,而是贴合现实生活,聚集当今中国的热点事件。他实现了从海外华人作家向中国当代作家的全然回归。

较之“新移民作家”,“新移民海归文学”创作主体的创作视点发生了转移。张翎在2001年出版《交错的彼岸》时说“写作就是回故乡”,她的话道出了一批“新移民文学”作家的心声,他们的共同立场是用文字抚摸故土,相对于大陆文坛作家而言,他们是“离场”者,以隔岸观照的姿态记述中国。而“海归文学”的创作者们已是一群“在场”者,他们以亲历的身份关注中国的文化传承与历史变迁,因此在文学表达上,海外创作最易被诟病的现象,即与中国现实当下之间的“隔”,在无形中就有可能被弱化直至消弭。

从总体上考察“新移民海归文学”,它的文学题材是丰富的,“海归作家”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领域都有积极的文学贡献。中国故事无疑是“海归文学”的创作重点。中国叙事是“海归作家”的主动选择。与之前的“新移民文学”立足于海外生活和域外体验不同,“海归文学”沉潜进中国社会,以中国想象和中国经验为他们的叙述重点。但正如刘俊指出的那样,这类“海归文学”的立场、视野和感受都具有杂糅性和融合性。施雨的《上海“海归”》展示了一种新的视角。她采访的对象都是扎根上海的“海归”,他们已与上海融为一体,他们考虑的事情是如何在中国更好地生活,而不是回归西方重拾理想和抱负。不可否认的是,“海归文学”作家因受中西文化的熏陶,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在潜移默化间渗透着西方的文化视野和自由诉求,因此他们的作品与大



历史与现实的民族身份认同 ——评陈河《沙捞越战事》

□谭 湘

真正的小说家作为艺术家的价值,往往就在于他们能在无人喝彩的地方、在非主流话语关注的所在,发现为大多数人所忽略的人类情感与心灵中永不过时的光芒。《沙捞越战事》的作者陈河敏锐地捕捉到了在碎片化的历史真实里隐藏的人物心理脉络,在梳理回望中触及到恒久的心理真实。一个加籍华裔战士在“二战”中于马来西亚的热带丛林参加抗日斗争的往事,六七十多年前那场似乎永远沉没到历史深处的战事和其中仿佛早已被人遗忘却英勇非常的生命历程,就这样被作者一点点钩沉出来。

不过,《沙捞越战事》不是一个简单的对历史的复活过程。这种不简单的复杂性首先源于人物身份上的“国际化特征”。主人公周天化与几个“二战”交战国的人们都有着一种质朴的共生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受残酷文化影响而对他国怀有仇恨的人,也并非天生就拥有无可置疑的民族认同感、和自己不必费心去认证的祖国的人。没有了祖国与民族的限制,也失去了祖国与民族的温暖,周天化这样一个本来没有参战动力的人之所以参军,恰恰源于他在移民国从来都不被认可拥有普通国民身份,源于他比父辈的第一代移民更惶恐的民族认同上的尴尬。

一个文化国籍含糊,虽是黄种人但身份已然国际化了的亚洲人,在“二战”中代表着西方的利益,深入到亚洲的热带丛林里与野蛮的土著人、共产党游击队和日本鬼子周旋,因为从空降的一开始就被日本人俘虏了,所以将计就计做起了名义上的双面间谍。作者在对周天化战斗生涯的描述中,穿插了他与土著人的爱情、与游击队生死一线的接触。只是土著人猜兰和周天化的爱情故事就颇为传奇;读者总能获得阅读的快乐和心理上的一种满足。这种满足是普通读者要求作品商业属性所能给予的一种基本需求,陈河在这方面是一位高手,他将符合主流商业规则的故事既能讲得淋漓尽致,同时又很具分寸感与把握力,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好莱坞式商业噱头的后面始终都有更为辽阔也更为深入的思考。

不管是杜撰演绎还是有史可依,《沙捞越战事》男一号周天化的特殊身份和经历是有相当寓意的,作者赋予周天化一个几乎无国籍限制的“客观”视角,从这个视角去看参战各方,对战争的性质与人类的愚昧做了一种有距离的、比较客观清晰的审视。主人公身份甚至情感上民族国家感的含糊在以往作品中并不多见。我们看到,正是这种含糊造就出了一种距离感,让第二代移民周天化格外惶惑与尴尬。他是加拿大的第二代中国移民,却从来都没有真正拥有过加拿大国的政治与文化地位,始终被作为蒙古人种而受到无时无刻的歧视;他为了改变这种状态而愤然参军,却又被深谋远虑的英国军方作为过河卒子投到了日本人的阵地上。日本人对于他自称的日本人身份最终确认,而正是这种确认引出了他对自己可能是日本人私生子的怀疑。土著人给了他爱,也给了他致命的威胁;游击队对他英国人的军装、中国人的自称与日本人的形象也不感兴趣,屡动杀机;而最后,在英国人为了挖出内部间谍而进行的夺城之战中,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周天化勇敢的死亡既可能是事实,也更是象

征;既可能是对移民者英雄事迹的忠实记录,也更是对移民群体国家民族认同问题的痛苦暗示与心结。

事实上,生活特定地域里的特定人种,用特定文化做着自己的限制也做着自己的保护。当个人或某一族群与自己的人种文化彻底割裂开后,“离散”就成了剧烈并且长期存在的心理过程。第二代、第三代乃至更多以代系称谓的移民,都可能在日常生活里埋藏着时时有可能会被触及的心理症结。这样的症结在战争时期会被突然放大,周天化正是在民族认同的生命沟壑前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从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历程来说,从他决定去参军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成了勇于探索、挑战命运的英雄。同为移民身份的小说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先辈移民的这一心理过程,看到了在移民中持续了几代人的民族认同的重要性,以此入手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创造。

小说所观照的还有民族、国家与战争和人的关系。作品没有将敌我双方做绝对的划分,而是从特定身份模糊的角度去呈现人类在野蛮战争状态下的残酷与荒唐,但其批判的矛头最终还是指向了侵略者。作者特别揭示了女性作为战争,作为人类所有丑陋的最大受害者,咏赞了两性至纯至美的情义,虽只是寥寥数语,却显示出其视野的开阔、公允和客观。一方面是事情过去六七十年以后,这个时代和作者都已拥有了足够冷静;另一方面也更因为作者身处北美大陆,能够发现站在民族内部视角所不能望得清晰的多面和问题,从而所拥有那种环境使然的“超越”——这种“超越”是海外作家们比之国内许多作家,除了相对沉静不浮躁的特点之外另一个重要特征。

由于主人公的特殊身份,作者可以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而审视过去和现在,审视多个民族的优缺点;西方民族的实用与傲慢、汉民族的善良与软弱以及大和民族的认真与野蛮。每个民族、每个特定地域里的文化差异,其实与丰富多彩的自然界一样存在着天然的秩序,互相尊重是这种秩序得以共存下去的前提。任何一种文化对另一种人类文化的侵犯与试图消灭的行为,都只能平添整个人类的苦难。侵略与战争是这种苦难的极端形式,而文化与人种之间的不平等与歧视,更是这种苦难的日常表现。要提高整个人类的幸福指数,惟有在此问题上表现出理智与智慧。

这一段“二战”时期沙捞越的战事,正好成就了表达作者关于民族思索的话语平台。作品有几乎一半篇幅的文字是在讲述移民的历史,而不是热带丛林里的战斗。移民与母国的关系、移民国与移民的关系、来自各个母国的人在共同移民国里的关系,都在小说的历史性叙述里被提上台面。海外华人的身份使作者经常要面对世界上的各个民族、体味和思考移民者的所有感触;而作为作家的敏感又注定了他要为本民族的英雄树碑立传,要抒发表达自己对于民族性的客观思索。作为小说家,他习惯使用好莱坞式的从真实历史里钩沉故事的笔法,将一段被历史淹没了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在战事的壳子里,我们望见的绝不仅仅是美国大兵式的为了战斗而战斗,而是每一幕战斗后面都有因为民族身份认同上的混乱与尴尬造成的存在张力。这种张力现在没有本质改变,依旧压在作者和其他移民者的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讲述的并不是过去已经化成正尘埃的周天化们的旧事,更是成千上万的中国新移民的现实。只有立足在自己的现实与现世中讲说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与文化求索,才是鲜活而富于价值的艺术创作。显然,陈河的这部《沙捞越战事》做到了这一点。

漂泊中的寻找 ——评吕红《午夜兰桂坊》

□江少川

打开吕红的中短篇小说,从那独特世界中,似乎读到了女作家从东方到西方跨时空、跨领域多方面延伸的艺术触点。

吕红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特色:第一为女性书写,吕红的女性主义表现为与存在论相结合,着重在展现“女性的日常生存体验”,揭示一种“原生态”;第二是时间诗学,表现为记忆中的时间和“共时性”跨越;第三是影像叙事,她将“视觉思维”融入小说创作之中,明显地打上了“电影想象化”的痕迹,成功地借鉴了影视艺术的叙事技巧。

《午夜兰桂坊》中,吕红用何种方式切入生活?我以为是“漂泊中的寻找”,她书写女性在离开家园后漂泊中的寻找;其一是在寻找一种生存方式,《秋夜如水》中的凌子到南方闯荡,蔷薇、芯远去美国漂泊,其实都是在寻找;其二,是在寻找爱情。吕红常把生存状态与婚恋纠结在一起,谋生与婚恋两条线交织、纠缠,表现女性谋生之艰难、立足之不易、婚恋之痛楚。她的笔触常常触摸到女性的心灵与隐痛。对于漂泊中的女性而言,婚恋就是她们命运的期盼与归属。然而无论在东方或西方,在现实生活的职场与商场,移民女性同样是被边缘化。在书写女性的寻找中,作家对男权主义的批判笔锋犀利而有力。她笔下的男性形象,有驰骋商场的骄子、有到西方闯荡的冒险家、有擅长投机的老板等,在生意场、情场都处在强势、中心的位置。在婚姻爱情中,女性同样摆脱不了弱势与被动地位,在吕红的中短篇小说中,女主人公几乎没有出现过圆满的结局。即使是在商场小有成就的女性,如《午夜兰桂坊》中的海云也面临婚姻解体。但这些女子对爱情依然保留着浓郁的东方传统,期待爱情的专一、忠诚,有着浓重的“家”的意识。而她们的期望终究没有得到实现。

对女性人格尊严的肯定与张扬是其女性书写的又一特色。吕红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照人的女性形象,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她们对精神自由的追寻,对人格尊严的维护。依据萨特本体论的观点:精神自由相比人的社会存在更真实。这与海德格尔提出的“人的本质的尊严”是一致的。这些女性形象在漂泊中寻找,也许她们还在寻找的路上,但作家在她们的肩上寄予了生命的关怀,寄予了理想与期望。

美国著名移民作家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谈阅读时说:“等到我们读第二次、第三次或是第四次的时候,我们就如同是在欣赏一幅画了。”他把这种拼贴图画非常形象地隐喻为“魔毯”。读《午夜兰桂坊》时这种感受特别强烈,这个中篇的现在时是梦薇在香港弥敦道上巧遇海云,这只是个现在时间的画框。作者在这个时间中,不时转换空间画面,时而北京、时而美国、时而香港。穿越一个个地理空间,描述梦薇与海云两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国内职场的打拼、移居美国的艰辛、商海的沉浮以及女人的婚姻种种都被容纳其中,在共时中“跨越”。

这种跨越还表现为时间断裂的“跨越”。这表现为小说人物在当下时间的“瞬间断裂”,意识呈现出幻觉、梦境、潜意识等审美幻象,这种幻象又往往表现为故乡的图景、人物,或故乡与异乡的“跨越”双重图景的拼贴、重组、交织,使意识坠入暂时的时间“黑洞”。吕红小说中经常出现这种诗化的意识流动,它是一种现实时间的瞬间断裂,小说中的人物回到主体心灵之中,进入梦幻状态的时间流。

邝金鼻同志逝世

广东省珠海市作协原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邝金鼻同志,因病于2010年8月15日在珠海逝世,享年71岁。邝金鼻同志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童话集《白藤仙子》、寓言集《长颈鹿和上帝》《阿凡提寓言》《动物王国里的寓言》等。曾获第六届、第七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等。

黄宗江同志逝世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一级编剧黄宗江同志,因病于2010年10月18日在京逝世,享年89岁。黄宗江同志1938年肄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新中国成立前参军,历任解放军三野副团、总政创作员,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193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剧作集《舞台集》《黄宗江剧影文学选》,译者《嫁接集》,散文集《你,可爱的艺术》《花神与剧人》,回忆录《我的坦白书》等。

宋群利同志逝世

天津市作协党组副书记、秘书长宋群利同志,因病于2010年10月25日在天津逝世,享年59岁。宋群利同志长期从事文学、文化组织工作,历任解放军4628部队战士,天津市二商局干部,天津京剧团政工科科长,天津曲艺团书记、副团长,天津文联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天津作协党组副书记、秘书长。201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